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王利器  
卷

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



王利器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利器卷/王利器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4

ISBN 7-5336-2191-3

I. 当… II. 王… III. 王利器-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479 号

---

责任编辑:唐元明

装帧设计:黄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页:1

印 张:18.125

字 数:400 000

版 次: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000

定 价:27.00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



## 出版说明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数千年的生成、拓展、吸纳、融合和嬗变，熔铸了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学术丰碑，汇聚了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可谓光耀千古，泽被万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条件、氛围大有改善，此间虽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当代学者们依然凭其不屈的人文精神，孜孜矻矻，勉力奋耕，创造出了不少无愧于历史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更如春际的原野，生机勃勃，满目葱茏，佳花异卉，令人流连，真正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难得盛景。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学术精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尽自己些微的心力，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使中华民族的学术之薪、智慧之火，燃烧更旺，烛照更久远！

鉴此，我社郑重推出这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本套书选收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的重要章节，旨在总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使优良的学术传统、严整的学术规范得以承传光大，使一代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新的面貌进入21世纪以至更远的时代。

为能更好地反映每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风貌，我们特请作者自选文稿，撰写自序、自传和主要著作目录，力求使读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学者们的学术世界，领略其学术精义，了解其研究方法，感受其思想和文字的魅力。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我们深信，当代学术将以其特有的底蕴、卓然的风采广为流布，嘉惠学林，裨益于后世。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

## 劫余话劫中之劫（代序）

我平素爱读《世说新语》。北大复员，我是初来乍到北平，听说有日本影印的宋本《世说新语》，我跑遍了琉璃厂、隆福寺的旧书店，都没有找到。于是我托张政烺先生代为搜访。不久，一个单干的书商王志鹏送来了日本影印的《世说新语》，他说：“是一个在门的书，要一条黄金，分文不少。”那时，国民党政府发的纸币，天天贬值，我们拿到薪金，都去东单市场买黄金、银元或美钞。当时我家眷没有来，我薪金高，又有稿费，收入相当可观，每次拿到钱就去东单换成黄金和美钞了。因此，我手上有金条。我横了一条心，一条黄金就一条，就把这部书买下来了。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宋本《世说新语》就是用的这个底本。自从我用金条买书之事传出去后，书店就经常来送书了。因此，我得精选而后购买之，收藏的书比较多而且精。有一天，我去团城同郑振铎先生商量《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题，主要是我认为哪些插图该抽换更好的和哪些应该增的。我拿出我拟好的清单交与郑先生，他看了说：“很好，就完全照你的意见去办。”正在此时，隆福寺鸿文书店老板葛鸿年送来一册装裱成经折本的陈老莲《水浒叶子》。郑先生略翻一翻，就递与在旁的徐邦达，徐邦达看了两页就还

给郑先生，郑先生又递与我，我接入手仔细一看，是陈洪绶少年时在萧山来家做客时所作。那时，陈洪绶正在学吴道子，还未自成一家，与郑先生影印刻本陈老莲《水浒叶子》，风格迥然不同。本来宋江三十六，只有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癸辛杂识续集》上），为了配合叶子戏，陈洪绶遂画成四十人；史大成手书龚圣与赞时，尚缺四人，是由他补足的。这和柴萼《梵天庐丛录》所载并记叶子为虫蚀，幸未伤及人物，于是为之装裱成册叶的情况，完全相合，心里为之惊喜。这时，郑先生跟葛鸿年说：“这个册叶靠不住，我们不要。”徐邦达噤不作声，我也不想说别的。于是葛鸿年收拾起册叶，就废然而返了。随后，我也告辞郑先生，从团城回来，径奔隆福寺，向葛鸿年讲：“这本册叶我要了。”他说：“我在济南刘成禺（时人称为北刘）家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前后护叶的狂草就是他写的。刘成禺说：‘当年在天津是拿四十多间房子换来的。’这回他出让，要价也是很高的。”我说：“不管多少，我要了。”这样，这本册叶就归我了。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封面的宋江像，就是用的这个册叶的宋江像。有一个和康生相熟的人，在康生处看到一本临摹的陈老莲《水浒叶子》，康生当成真的买来了，这个人向康生讲他买的是临摹本，原本在王某处。于是，他来我家说：“康生要看您的陈老莲《水浒叶子》。”于是，他从我处拿去了。后来我催促还我，还回来了。未知当时康生何以尚未公然强取豪夺以去也。但在后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退还我的图书时，没有这本陈老莲《水浒叶子》，至今还是一个谜。上述二事，说明我敢出大价钱买书，只要我需要，我是毫不在乎的。但也有我买得起而没有买的。那是我还住在东四十条胡同北大教授宿舍



时，有人从东北搞来一部宋本《经典释文》，我一看是被溥仪带出宫的国宝，多少人想看而不得见的宝书。当时，我买得起，却陡然想起白居易《李夫人诗》“尤物感人亡不得”的诗句，不想要，于是对那位朋友说：“假如您放心，就先放在我这里，再说。”他说：“可以，就放在您那里，以后再说。”大概他也知道这是故宫流散出去的国宝，不好脱手，就一直放在我那里了。于是我就拿我收藏的通志堂用开化纸初印的《经典释文》来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作了校勘，大概三个多月完成了，我才把宋本原书退还他了。后来，汉口徐行可先生见到我的校本，十分惊喜，把我的校本借去了，说要传校一本。其后，徐先生逝世，听说他的藏书都归武汉市图书馆了，我也无法去清问。但是，我却因得见此书而写了一篇《经典释文考》，作为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论文，文中提及的宋本，即指得之经眼之海内孤本矣。另外一事，就是我的四川大学同学石晓辉女士，她通过我的北大同事吴恩裕教授来找到我，送我一部《八旗艺文编目》，说要把《编目》所载的全部书籍，也就是《雪桥诗话》所据以成书的全部书籍出让，她不愿意亲自出面把书卖与公家或书店，她说：“我想卖与老同学。”我于是同她一道去西城东养马营四号杨宅了解这批书的具体情况。我看了过后，十分喜爱，因为这一批书绝大部分是清初刻本，还有一些抄本，尤其是有不少材料与《红楼梦》有关（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绿烟琐窗》稿本、《懋斋诗钞》稿本、《枣窗随笔》稿本以及《四松室集》、《春柳堂诗稿》等都是用的这批书作底本），是极为珍贵的。红学已初步发展起来，这批书可提供不少研究资料，放在私人手里，垄断起来，靠点枕中鸿宝，就想成名成家，非余之所欲也。于是我去团城向郑振

铎先生讲此事，他大为惊诧，说：“这批书颇为难得，您不要买，由我们买。”我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才来向郑先生讲嘛。”于是他派人同我一道去东养马营杨宅。我把情况向石晓辉女士讲清楚了，她同意，于是我说：“以后怎样，您和郑振铎先生洽谈，我就不插手了。”听说后来每本作价五角成交，书归北京图书馆所有。可惜北图把这批书打散了，随书内容编目上架，查阅起来，颇为不便。琉璃厂书商单干户老孔有一天来向我说：“西城有一家姓李的，解放前是京西一家煤矿公司的股东之一，他收藏有不少敦煌卷子、字画、明版书，想卖，我们去看一看吧。”于是我们一道去李家看了，敦煌卷子全是佛经，有一卷是古梵文的，书则大部分是《杜甫诗集》，字画不少，挂了满屋子，还有没挂出来的。我觉得可以挑选，于是跟姓李的说：“隔两天，我去约作家协会一位诗人来看您。”因为田间同志曾向我表示，希望帮他买点杜甫的集子。这回机会来了，隔两天，我就约他一道去李家。田间同志把所有明版杜诗都要了。我则把二十多个敦煌卷子、张伯英藏李攀龙字幅和张船山两副对联要了（后来，我把张船山一副对联送给遂宁博物馆了），价钱也不贵，我和田间同志都满载而归。后来，田间同志调到河北省文联工作，也把这批明版杜诗当做随身宝了。隆福寺的带经堂书店，我去逛隆福寺都要在那里坐一坐。有一天，碰上这家书店刚刚进一批小说，有崇祯本《金瓶梅》，书有插图，很完整；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册，有“七品官耳”章，涵芬楼影印的以无嘉靖元年壬午（1522）序，遂认为弘治本了；明郁郁堂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版心题“郁郁堂四传”）；清卧闲草堂刊小型本《儒林外史》；又有活字本《红楼梦》一部，大概由于经常有人翻阅之故，线断页

子散，卷头的石头图已残破。我见到这批书很喜欢，我说：“我都要了。”带经堂的少东家王世英对我说：“这批书是从敌伪时期的天津县长李少微家搞来的。李少微是李盛铎的后人，有李木斋藏书，据说还有《永乐大典》六册，都是小说戏曲；大概由于李少微爱好的缘故，又有钱有权，因之他搜集不少小说。”我说：“那六本《永乐大典》有下落没有？”王世英说：“日军投降后，这个天津县长李少微被枪决了，他的姨太太叫老六的把这六本《永乐大典》拿走了。据李家的人讲，后来老六搬来北平，住在崇文门一带，我曾经去崇文门一带打听，根本没有人知道老六其人。”我说：“要继续打听，把老六找到，那六本《永乐大典》就会有下落了。”王世英以《红楼梦》书颇漫漶，我把卷头的石头图描绘补全，于是他叫姓刘的伙计装修成很精致的金镶玉的两套书了。这批书归我之后，颇为人所艳羨，尤其是崇祯本《金瓶梅》有完整的百二十幅插图是极为罕见的。自从我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只发生活费，稿费来源已断绝，八口之家生活是够困难的。科学院历史所谢国桢来和我商量，他说：“天津图书馆的黄馆长愿意要您的《金瓶梅》等小说，您把这批小说出让给他好不好。”为解决生活困难，不得已就忍痛割爱了。书去之日，我心里是十分难过的。

日军投降，北平市遣返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在离开北平之前，每逢星期日，率在东四南大街过去是日本人搞的什么机关所在地出卖他们所藏的书。有一天，在北大留用教满文的今西春秋告诉我这个消息，于是我每逢星期日都去那里采购，收获不小，所购得有：甲辰四年（1784年，当乾隆四十九年）大坂书林刊平安秋水园主人辑《画引小说字汇》，庆应元年乙丑（1865年，当同治四年）江户书林刊安井衡撰《管子纂诂》，

日本重刊万历三十一年(1603)朱吾弼重刊《朱子语类大全》(有“织田氏图书记”、“君山遗品”收藏章),元文二年(1737年,当乾隆二年)洛东狮谷白莲社刊慧琳《一切经音义》,宽文九年(1670年,当康熙八年)书肆山形屋覆刊明金闾钱国焕刊璩昆玉纂集《古今类书纂要》,又一部享保十四年己酉(1729,当雍正七年)京师书馆据山形屋版重印本,《三体唐诗》有裴庾注为他本所无,京都藤井佐兵卫刊《文镜秘府论》。又有影印本,如“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宫内省图书寮藏古抄本《文镜秘府论》,“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宋槧本《毛诗正义》(原缺卷一至卷七),昭和十年(1936)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嘉庆六年(1781)同述观梓《拜经堂丛书》(这套丛书包括:《拜经日记》十二卷,《经义杂记》三十卷,《卢氏礼记解诂》一卷,《华严经音义》三卷,《诗经小学》四卷,《宋本尔雅》三卷,《汉书音义》三卷,《三礼目录》一卷,《郑氏六艺论》一卷,《蔡氏月令章句》二卷),又有吉川幸次郎、小川茂树、平冈武夫集资影印《汉书疏证》(吉川等疑即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所载之杭世骏撰《汉书疏证》,余以《道古堂文集》二十三《志西汉盐铁》一文与《汉书疏证·食货志》“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条文完全吻合,定为杭世骏撰),又有朝鲜刻本《语录解》,与《艺海珠尘骈字分笺》合册,有“君山修史在韩”、“君山遗品”朱文章,此皆难得之书也。但是有一个星期日,摆出一部元刻本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系罗振玉藏书,书品佳,标价甚昂,我身上带的钱不够,我向主持人商量,请保留下来,下星期日我来买。等到下星期日,我带足书款去买,已经没有了,失之交臂,至今犹未能忘怀也。

北平围城期间,通县已解放,北平的照明、发电厂在通

县，于是经常停电，北平成为黑暗世界。同时，市上粮食紧张，人心惶惶。北平市为照顾北大、清华两校的教授，给每人发了一袋加拿大面粉、两桶煤油，我拿来都放在寝室里。来串门的书商看见面粉和煤油很羡慕，请求我把面粉和煤油和他们换书。我从王蕃同志处得知，北平很快就要和平解放了。于是我就拿一桶煤油和这袋面粉换了不少的好书，这些书有：精抄本《学林》（有“棟亭曹氏藏书”、“长白敷槎氏董斋昌龄图书印”、“东武李氏收藏”朱文章，原缺第三第四两卷，璋煜氏假汉阳叶氏藏本抄补），初印本《抱经堂丛书》（有“莫友芝图书印”、“莫印彝孙”、“莫绳孙字仲武”朱文章），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方虚名辑注《南华真经旁注》（有“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朱文章），乾隆七年（1742）明善堂刊《四书五经》，康熙四十三年（1704）泽存堂重刊宋本《玉篇》及《广韵》（初印本），光绪六年（庚辰，1880）式训堂刊董增龄撰《国语正义》，《佩文韵府》（开花纸初印，黄绫内套，黄布外套）。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了，我悔恨自己没有远见，为啥还要留一桶煤油呢！自此以后，我的藏书不仅多，还相当精，约有三万册。后来，我由红二楼搬到东四十条三十九号北大教授宿舍，光是书就来回搬了几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附近五中的学生来造反，肆意破坏，我生怕我的书遭殃。第二天，我就把我的好书两大书柜交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开车来把这两书柜的书连书柜也一道运走了，这批书有：《大乘大悲分陀利经》数朝邈邈经折本（以千字文编号，有随函音义，其赖三卷末有补刊“天圣三年（1026）五月十日忠州刺史种师道刻定”字样，赖二号七、八夹缝处有“元祐二年山西太原府在城信士张杨氏补刊”字样，其余补刊页子则元明清三朝

俱有之，以土纸裱褙，极笨拙，盖以供寺僧呗赞之用者。余时正在作《水浒全传》校注，重其刻定人忠州刺史种师道为《水浒传》中人物，爰过而存之），有元大德丁未十一年（1307）李果序刊本《风俗通义》，明刊明装白绵纸《艺文类聚》（有明兵部尚书“张延登”印章，王渔洋之老丈人也），明刊大字白绵纸本《通典》，明刊小字白绵纸本《文献通考》，明刊原装白绵纸中都四子本《淮南子》，明第一桂刻白绵纸《淮南子》（有惠栋藏书印），明刻本姚旅《露书》，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年）无锡华氏剑光阁据宋本校刊《事类赋》（有“莫友芝图书印”、“莫绳孙字仲武”、“莫印经农”藏书印），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丘云岷刻丁采《小令》，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年）养素堂刊《史通训故补》，朱彝尊手批《腾笑集》，又手批《李义山集》（壮年及晚年两次批本），李慈铭手批《十驾斋养新录》，陈季皋先生手批（含遯录黄季刚先生批语）《广雅疏证》等。当文物管理处退还书时，他们问：“据了解，你还有些善本书，为啥这里面一部也没有？”我欣然告诉他们：“实在对不起，‘文化大革命’头两天，我已经把我的好书抢先一步交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他们愕然相顾，怒目而视。

继五中学生造反之后，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造反派来的，把我和廖德容戴起高帽子敲起洗脸盆去游街，没有引起街坊邻居兴趣，还不到半条街就冷没愀愀地回来了，把我关在贞平住的那间小屋子里。他们到处搜索，折腾了半天，临走时，拿去一些东西，给我开了一个清单，签上造反派头头的大名。我记得这批东西里有我很喜爱的一个竹搁臂，是柳如是画竹、钱谦益题字，纪年是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有朋友说：“雕刻当也出于柳如是之手。”以后他们拿去东西就没有开清单了。平

反后，我拿这个清单去向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会办公室寻问，他们说：“是有这个人，已经毕业分配去广西了，我们查一查，等几天你再来一趟。”过了几天，我又去寻问，他们说：“工业大学查抄物资仓库里没有这些东西，跟广西联系，那个人手边也没有这些东西，广西方面已责成这个人把事情交代清楚，包括除此之外都要搞清楚。”我得到结果，如此而已。

我的问题平反后，北京市为了落实政策，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让我去府学胡同领取退还的书籍。我一看清单，首先注意到书不到一万册，一些文物古董没有，我积累多年数以千计的卡片也没有。我问：“我的书远不止此，还有些文物古董、很多卡片，为啥没有？”有一个姓王的——后来知道是负责人，他说：“你的书有的单位和个人拿去了，以后有还来的再退给你，文物古董我们放在另外的地方，等两天我带你去领，至于卡片，我们没有要。”我听到此话，心里很不舒服。接着姓王的又说：“都送去造纸厂了。”我听到这句话当时就哭了。一个姓萧的原是隆福寺文渊阁的老板，他说：“哭什么，百衲本《二十四史》都还给你了，你还要哭。”于是我请出版社派车来拉书，当这批书搬出文物管理处大门时，就有人跟我说：“王某，你这些书是残的，你拿回去没有用，卖给我们吧。”我说：“你怎样知道是残的？就是残的也有用，我拿回去生炉子，我不卖。”就这样把书运走了。第二天，我去找到姓王的，他说：“文物在北海后门，你跟我一道去取。”于是我和他一道来到北海后门一个地方，有一位女同志接待我们，姓王的随即到另外的屋子去了。那位女同志说：“你就是王某，我曾参加登记你的书籍，真是不少。”姓王的随即搬出一些东西，他说：“你的东西就在这里。”我一看，说道：“我的敦煌卷子有二十多个，

不止八个。我还有些瓷器，有徐世昌收藏的张廷济钟鼎文对联，看张叙未很自珍他这副对联，隔了两年，他又写了题跋在上，还有着色的袁崇焕造像，纪晓岚藏砚一方（他的《砚谱》著录过这方砚），还有孙星衍字嵌镶在古钱纹玻璃镜屏里，还有齐白石画兰记年七十三岁的玻璃挂屏一个等。”姓王的说：“以后清查出来再退还你。”我看到还有几块乾隆朱墨，把龙纹图案都铲平了，心里很难过，难道文物就应该这样管理吗？又惊奇地看到张伯英藏李攀龙手书诗一轴，我说：“李攀龙是明七子，是有名的诗人，他的真迹很少，假如你们知道，恐怕就不还我了。”姓王的听说赧然，他说：“你的瓷器什么的，没有在这里，等清查出来，再通知你来取。”退还的还有张船山对联一副，后来我把其中的一副赠送给遂宁市博物馆了。隔几天，文物管理处通知我去东单一个地方领东西，我以为是不不少的，于是约到二女儿贞慧及其爱人王康明一道去，结果仅有纪红胆瓶等三两件而已。

退还的书籍，经我初步检查出显然有残缺的，如明刻本《涌幢小品》就只有五本，渭南严氏刻《颜氏家训》就少了二本，《论衡校释》就少了一本等。凡是残缺的都没有列入清单。又发现有江青、康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打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横方形朱文印章和某机关已经编号的如《齐东野语》为MJ-1798/4-1等。江青拿去的日本刊安井衡《管子纂诂》一函十二册，都在蓝青色（欲谓之慈青）书皮上打上“江青藏书之印”白文朱红图章，叫人看不清楚庐山真面目，此又作俑者之一绝也（江青拿去我的书还有，此举其可笑者耳）。至于康生，如所周知，凡在文物管理处拿去的书，每部书不管大小，都要付书价五分钱，然后打上“天下为公”的图章。他拿



去我的雍正刻本《西厢记》，前有篇序文是它本没有的，他拿去写了题跋，描绘一个“康生”图章，倒填年月，说是“文化大革命”前购买的，却又在“四人帮”倒台后退还我了，真是作伪心劳日拙的丑闻。至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其手法则又不同，他们在退还我的敦煌卷子，万历庚辰八年（1580）重刊嘉靖乙丑四十四年（1565）《相里张氏六世诗谱》（遮盖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图章隐约可辨），明刊本《史通》，行有恒堂抄本《明宫词》等，已经打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图章，又打上一片朱色印泥，以图遮盖，却没有料到反而弄得欲盖弥彰。其有遮盖不住的，干脆把它毁坏，如《史记会注考证》第一册的书名页就被撕掉了。痛定思痛，奈何反遭此劫中之劫也！今兹浩劫虽然过去，劣迹仍然留传，将来如有风吹草动，难免又有心怀叵测之徒，据此私设公堂，说我盗窃公家图书，说我和康生、江青有来往，要我交待。我真百口难辩了，心有余悸，不禁口有赘言也。